

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见物 见“人” 见生活

周飞亚

“濠溪河遗址发现的植物遗存里有花椒，这说明，舌尖上的麻辣四川，可能从6万年前就开始了。”4月23日，在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终评会上，第一个项目的汇报就趣味十足，牢牢抓住了现场观众的注意力。

2024年，全国开展主动性考古发掘259项、基本建设考古1481项，进入终评会的20个项目都是优秀代表。经过激烈角逐脱颖而出的“十大”，是累累硕果中最甜美的果实，体现了“大考古”理念的阶段性成果，从中也能看到考古事业发展的一些现象和趋势。

入选“十大”的项目多是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国家重大项目的引领下开展。从人类起源、文明起源到早期国家形成的统一进程，再到边疆地区考古彰显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聚焦关键性历史课题。考古工作者也在努力提高讲故事的水平，用鲜活的细节为宏大历史进程写下生动注脚。

四川资阳濠溪河遗址考古队长郑喆轩关于“花椒”的讲述是典型的一例。该遗址第一次系统展现了早期现代人的“食谱”，包括象、鹿、鱼、鳖、核桃、浆果等，他们会用火，喜欢用硅化木制作的石器，也使用木器，在石块、骨片、橡果等各种材料上留下神秘的刻划痕，他们或许还会利用草药——遗址发现了接骨草，这种植物在今天的中药里仍然存在。遗址全面展示了一个旧石器中期的社会，对研究东亚现代人起源演化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浙江仙居下汤遗址全景式呈现了

距今9000年前后的中国最早的农业聚落，包括房址、墓葬、食物加工厂、红烧土广场、道路等几乎所有遗迹要素。

不少项目都是老遗址取得的新发现。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掘和研究，要想实现新突破，需要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清晰的学术目标，久久为功。

马家窑文化是世界最负盛名的彩陶文化之一。马家窑文化被发现至今已有一百年，其生业经济、聚落形态、社会组织、文明进程仍模糊不清。黄河上游的农业资源远比不上中原地区，马家窑文化的发展靠什么？马家窑彩陶为何能够快速扩散？带着这样的问题，考古团队在甘肃临洮寺洼遗址找到了目前已知规模最大、级别最高、内涵最丰富的马家窑文化中心性聚落，展现了一种重视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的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新模式。

陕西宝鸡周原遗址是规模最大的先周、西周时期遗址，学界相信是周公宣父迁岐之地。由于一直未发现先周文化的高等级建筑，致使遗址的性质不能最终确认。考古团队以厘清城市结构和判断遗址性质为首要目标，终于在遗址的王家嘴区域发现了先周文化建筑带，同时确认了遗址存在“宫城”、小城与大城3座西周城垣，得以将之前发现的大型建筑、铜器窖藏、墓葬等纳入城市的不同空间。在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星灿看来，城垣的发现可谓“纲举目张”，“过去几十年的散乱发现可以统筹画到一张图上，旧发现都被带活了”。

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的发掘“十

年磨一剑”。过去，盘龙城被认为是商王朝控制长江中游的重要据点。新发现表明，在二里头晚期，中原的势力已扩张到这里。结合过去的资料和最新考古发现，遗址古代景观被重建，城市聚落变迁过程得到清晰展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认为，新发现改写了人们关于长江流域早期文明发展以及长江、黄河流域文明统一进程的认知。商王朝的青铜器技术，很可能就是经由盘龙城传到了三星堆。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是目前发掘时间最长、面积最大、内涵最丰富的西周封国遗址。此次通过人类全基因组测序，首次在商周考古领域复原了古代家族树。北京联合大学校长雷兴山感慨，琉璃河考古的新突破，不是来自量的积累，而是系统性的跃升与质变。

西藏康马玛玛措遗址呈现了新石器时代海拔最高的“打鱼人”的生活。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通过建筑基址、构件、佛像残件、纺织品等，勾勒出公元1世纪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模样，及其如



及名称。曾侯乙编钟上的铭文，大意为音位郝勤建撰



4月17日，“随州曾侯乙编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这套举世闻名的考古出土文物，以文献的形式，成为受全球保护和利用的世界文化遗产。

1978年出土于湖北省随县(今随州市)的曾侯乙编钟，是经由科学发掘而发现的迄今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青铜打击乐器，也是战国早期一位诸侯——曾侯乙享用的礼物。全套编钟65件，器形、音响完好，绝大多数钟体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其上发现的3755字铭文，除少量为记事外，都是与所在钟体上的乐音相关的编号、标音及乐律学理论，这些内容大多早已失传。全套编钟的声音和文字对应，以独一无二的形式，系统完整地阐释着编钟乐音体系，如同一部有声音的典籍和有文字说明的音响档案，可看、可敲、可听、可读，是目前仅见的中国先秦官方乐律文献。它证实了中国编钟“一钟双音”的声学创造和“十二律”体系，刷新了人们对先秦音乐的认识，改写了世界音乐史，是人类珍贵的音乐记忆。这正是它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原因。

曾侯乙编钟从出土到入选《世界记忆名

录》，相关的研究、保护、利用、传播，如同一场持续不断的文化传承与传播。

曾侯乙编钟原件除常年于湖北省博物馆向公众展出之外，曾先后于1978年8月(随县)、1979年9月(北京)、1986年3月(武汉)、1997年春(武汉)的现场表演和影视交响乐作品中，展示其铿锵优美的乐音。1983年1月，曾侯乙编钟复制研究暨曾侯乙编钟复原研究成果通过科学鉴定。1984年9月，曾侯乙编钟复制工程通过国家验收。自此，曾侯乙编钟以其“形声俱备”的化身活跃在国内外著名博物馆、音乐厅，焕发古老礼乐重器的魅力和活力。这位古老的“文化使节”已巡展演出20多个国家、线上线下聆听过曾侯乙编钟的观众有近10亿之多。

2001年10月，“曾侯乙编钟”成为第九届国际中国科技史大会主题，被誉为世界科技史上不可多得的“科技活书”。随后10多年，湖北考古陆续发掘“曾世家”系列，接续起曾侯乙编钟从受封立国开始的600多年的用钟史，证实了曾侯乙编钟是数千年青铜乐钟经验和技术的总结，是中国先秦礼乐文明与古代青铜铸造技艺的巅峰之作。2015年，由国内三代学者用11年时间编撰的大型专著《曾侯乙编钟》出版。如今，这项国际性研究领域已涉及考古学、历史学、科技史学、冶金学、声学、天文学、古文字、化学、音乐等多个学科。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充实了曾侯乙编钟的世界性价值。

2016年，第十届国际音乐考古大会通过

曾侯乙编钟

人类共同的音乐记忆

冯光生

《东湖宣言》呼吁将曾侯乙编钟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申报工作正式启动。2023年12月，湖北省博物馆举办“中国记忆——曾侯乙编钟出土45周年文献展”，大量文献资料见证曾侯乙编钟的发现认识史，折射它从随州走向世界的历程。

曾侯乙编钟出土47年的历程说明：一次举世罕见的考古发现，绝不止于一本考古发掘报告和一个专题展览。几代文博工作者的辛勤耕耘、国内外多学科的专家学者通力合作，还有大众的热情关注和参与，推动曾侯乙编钟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

曾侯乙编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从档案文献的角度看，复杂的音乐数理关系和发达的抽象思维能力，更为深刻地体现了其在人类文明史上的独特价值。这将引导更多受众从体量、数量、工艺、装饰、声音等直觉的层面，深入感知其中的智慧和精神，也会促使相关研究向更为广阔的领域深入发展。

曾侯乙编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为世界提供多元文明互鉴的范例。其乐律铭文中涉及长江、黄河流域的诸侯国曾、周、楚、晋、齐、申等国的律名，显示其在当年南北文化广泛交流和融合的重要作用。世曾侯乙编钟兼收并蓄，促进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这部公元前5世纪的有声乐律经典是中国智慧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愿这份珍贵的遗产为人类带来和平的福音，为时代响起辉煌的乐章。

何一步步与中原诸文化元素融合。

重要文字资料的丰收，是本次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另一个亮点。周原遗址在宫城南门外壕沟内出土卜甲、卜骨残片213片，初步辨识出刻辞295字，甲骨刻辞内容丰富，涉及天文历法、历史地理、军事战争、数字卦等多方面，发现多个国族名、人名，其中首次出现“秦人”。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1万余件器物，其中载体丰富、内容多样的文字资料令人兴奋。椁木上发现大量墨书文字，此外还有青铜器铸刻铭文、彩绘文字及竹简等。琉璃河遗址出土作册奭器组合及铭文“太保奭燕”，成为北京3000年建城史的又一实证。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益州”铭文瓦当，1900余枚封泥，5000余片有字简牍，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土的“滇王之印”等相互印证，证明遗址为益州郡及滇池县官署所在。简牍上发现西汉时期30个纪年，时长跨度263年，证实自西汉中期武帝设立益州郡以来，中央王朝在此进行了长期稳定的统治。

上述新发现不仅是一年来考古成果的突出代表，更是多年学术研究的阶段性总结。期待更多精彩考古成果的涌现，带领我们一次次踏上穿越时空的文明之旅。

▼西藏康马玛玛措遗址第二期出土的遗物(石质、骨质、金属装饰品、骨针、滑石珠、红玉髓等)。



▲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出土的有字卜甲，发现月相名“融”。



▲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出土的铜带釜形器。以上图片均由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活动办公室提供



在东北烈士纪念馆有一本《东北抗日联军歌集》，完整保存了抗联将士的精神图谱。这本歌集长19.5厘米、宽13.5厘米，蓝色油墨印制。由于年代久远，纸张泛黄，有几张已碎裂，部分字迹模糊。末尾两首歌曲用蓝墨水书写在红格信纸上。封面写有“东北抗日联军歌集 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印”字样。

1940年夏，抗联三路军总指挥部在德都县(今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北部朝阳山密林后方基地举办军官干部训练班。总指挥部机要秘书兼电台台长崔清涛收集整理部队传唱的革命歌曲，手工刻印成册分发给指战员。女战士李敏冒着战火保存下这本歌集，1948年捐赠东北烈士纪念馆，是现存唯一完整版本。

歌集收录有48首革命歌曲，作者大多是抗联将士和革命群众。有的取自国内的抗日救亡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红旗歌》《新女性》等。歌曲内容是抗联将士战斗生活的真实再现，几乎包括了东北抗联14年苦斗的各个方面。

一是控诉侵略暴行。为长期霸占中国东北，日本侵略者炮制伪满洲国政权，形成一套严密的军、警、宪、特统治机构，对东北抗联进行残酷镇压，为隔断东北抗联与群众的联系，实行残酷的集团部落制度归屯并户，给东北人民造成深重的苦难。抗联将士在《救国雪耻》中控诉：“万恶日帝狡猾毒辣，归屯策收财产无辜遭屠杀……”《九一八事变》《东北悲响》《国耻纪念歌》《反日四恨》等创作于密林深处的战歌，既是文化反击，更是唤醒民众的号角，彰显东北人民不畏强暴的爱国精神。

二是再现战斗生活。李兆麟等人创作的《露营之歌》生动描绘了抗联部队西征的战斗与生活，成为将士们肩负民族解放重任和奋勇向前的号角。《露营之歌》写道：“铁岭绝岩，林木丛生，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再配以古曲“落花调”，歌曲写成后，迅速在东北抗日联军各部队中传唱开来。

抗联部队日常军事训练的内容也有所体现，如《战斗歌》《从军行》《杀敌歌》《冲锋号》《战斗职责》《战斗射击》。在《战斗射击》中的“战斗时杀敌时沉着”“射击时要先测量”“发射时停止呼吸”等内容，多角度生动再现了抗联战士射击训练的场景。

白山黑水间，东北抗联采用伏击战、奔袭战等游击战术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斗争。歌曲记录了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等抗联将领对抗日游击战的总结。其中，杨靖宇创作的《四季游击》反映了抗联春夏秋冬四季的游击生活，歌词最后一段写道：“雪地游击我们有特长，穿踏板，扶长杆，不用喂草粮。登高岭，走洼甸，步履比马快”，反映了抗联冬季采用滑雪方式开展游击战的场景。

三是军事纪律建设。东北抗联是党领导的抗日部队，纪律建设是部队工作的重要环节。歌曲则成为向广大战士简明阐述纪律要求的方式。比如《十大要义歌》，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歌词：“舍己为群，忠贞坚毅，服从命令，遵守纪律。”

这本泛黄的歌集不仅是音乐文献，更是解读东北抗联的“精神密码”。它记载了3万将士减员至千人的悲壮历程，见证着杨靖宇、赵尚志等民族英雄的精神轨迹。每首歌曲都是鲜活的历史切片，从军事训练到群众工作，从战术总结到理想信念，全方位勾勒出抗联斗争的历史图景，是在抗日战争洪流中锻造出的珍贵作品。(作者为东北烈士纪念馆馆长，崔佳、郭晓龙整理)



封皮。东北抗日联军歌集。东北烈士纪念馆供图

博古知今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中心已有数千年历史。“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城市遗产是数代人劳动与智慧的结晶，是公共历史在空间上的积淀，理应是人民的共有遗产、市民的共同财富。城市遗产保护强调将历史城镇的保护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在保护城镇历史空间的同时，促进其发展并适应现代生活。

呵护城市遗产的烟火气

张松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世界文化遗产，丽江的城市特色主要表现在“天人合一”的古朴风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景观。保护中求发展、发展中守特色，是丽江的城市发展理念。丽江的保护既包括自然山水环境，也有人文历史风貌，还有多民族的美好和谐生活。丽江的区位优势并不明显，却成为人气旺盛的旅游目的地，反映了中国特色名城保护实践的探索成果，也证明了保护就是发展理念的科学与先进。

扬州古城内的仁丰里历史文化街区，明清时代形成的鱼骨状街巷构成了活着的社区遗产。10多年来，街道基层政府主导推进“自下而上”的保护方式，以历史环境保护为线索，依靠原住民开展社区治理。通过保护更新行动，老房子老院落得以修缮，社区生活的原真性得到保护，实现了以百姓幸福生活为目标的基层民主治理。仁丰里社区治理实践是“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一处生动注脚。

无论丽江城市保护还是扬州街区的微更新，都是城市遗产“共有、共保、共享”的实践案例。城市遗产是构成人们共同身份的基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不只保护管理城市具有重大意义的单体建筑遗产，也要对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地段实施整体性保护更新。整体性，包括了政策、制度、资金、技术以及公众的参与。因此，依靠广大市民的共同参与，城市遗产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系统性保护和积极有效的维护管理。

文化积淀和差异性城市的活力所在。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时，要充分考虑居民的生活需求，保留他们的文化和生活习俗。也要注意避免雷同，把地区的区位特征、历史空间特色、地域文化特色研究透彻，与民众需求进行创造性转化和有机衔接。

历史城区是有人生活居住的城市社区，保护和活化利用的成果必须惠及民生，促进经济发展，这样才能成为充满烟火气的、活着的遗产。



本版邮箱: ysjbs@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 任姗姗 版式设计: 赵德汝

河间歌咏越千年

唐雨童



作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家喻户晓。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诗经》四大学派之一的《毛诗》，发祥地正是我的家乡——河北省河间市。早在2006年，河间歌诗就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

河间歌诗就是用河间方言搭配先秦古韵来吟唱《诗经》，是一种独特的综合艺术形式。以歌伴诗，载歌载舞，既保留了先秦诗歌的韵律特点，又通过熟悉的乡音传递出老百姓的喜悦哀乐。它就像一条流淌在民间的文化血脉，自然地融入了本地的婚嫁嫁娶、节庆民俗活动。

去年暑假，我为了完成博士论文，回乡进行方言文化调研，专程拜访了河间歌诗代表性传承人袁孝信。袁爷爷说，

河间歌诗已流传了数千年，“但凡有人想听，俺就亮嗓子唱，有人想学，咱就教。就这么着，让子子孙孙都能接着传”。

我随袁爷爷参加了每年都会举办的歌诗大会，观看艺术团登台表演。一声清脆的古筝响起，悠扬的旋律如山间清泉般流淌而出，紧接着，二胡的低吟与古筝相和，歌者们轻轻开口。那声音时而高亢，如《伐檀》中劳动者的豪迈呐喊；时而婉转，如《蒹葭》中朦胧缠绵的淡淡哀愁。每一句诗都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直击人心。接着，村民们依次登台，朗诵起自己创作的古诗。这些诗大多围绕乡村生活的点点滴滴，如农耕、过节等。其中一首诗让我久久难忘：“春风吹绿麦田边，老牛耕地起新烟。手扶犁耙忙一日，望见丰收心里甜。”这是多么质朴无华的语言，多么真挚纯粹的心愿！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佛寺是第一批国保单位，也是世界文化景观遗产五台山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寺位于山西忻州市五台县佛光村，寺内有三进院落，层层递升，最顶端是主殿东大佛殿，建于唐大中十一年，是中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木构建筑之一，被中国建筑学家梁思成誉为“第一国宝”。

佛光寺因山势而建，坐东向西，三面环山，山脚下溪水潺潺。从寺外看，佛光寺掩映在山林间几乎看不见，与周围自然环境浑然一体。可以说，佛光寺是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

近年来，佛光寺周边自然环境越来越多受到经济建设活动的影响，保护工作迎来新挑战。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忻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以下简称《保护条例》)将于5月1日起施行，佛光寺的文化景观有了双重呵护。

文化景观保护条例针对自然与人文融合的复合型遗产制定专门规则。目前，我国有6处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其中4处针对文化景观出台了保护条例。“针对佛光寺这一处国保单位出台文化景观保护条例，在山西是第一家。”忻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贾建军介绍。

《保护条例》共6章32条，明确了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范围、保护对象和保护要求，以及相应的禁止条款和生态保护等内容。对于如何进行文化弘扬利用、文旅融合、风貌改善都有了具体规定。

佛光寺的文化景观有了双重呵护

付明丽



佛光寺。忻州市文化和旅游局供图

《保护条例》参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确定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范围是四周山脊线围合区域。考虑到佛光寺的管辖权限在山西省文物局，本条例保护范围的规定，此次不再涉及。

《保护条例》指出，佛光寺文化景观包括自然和文化资源，并提出6条具体保护内容。

自然资源方面，要保护自然山水，包括山体本体、峰峦轮廓的完整性、水系走向、古树名木等。此外，保护空间格局和景观

视域，保持坐东朝西空间格局的组成要素完整性，加强景观视域范围内建设管控。

文化资源方面，要保护文化线路和历史聚落，包括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考察文化线路的位置、走向，回家寨村和佛光村的传统格局、历史风貌、人文环境、自然景观环境等。此外，要保护文物古迹、文化艺术遗存和佛光寺承载的精神文化。

忻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路向东表示，当地将统筹协调文化景观保护与民生改善的关系，促进文化景观保护共治、共享。